

# “礼”字字源考辨

## ——兼论从“豊”到“禮”的演变与文化意蕴

梁静涵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5日

### 摘要

本文通过对“礼”字进行字源考辨,并辨析其早期字形“豊”与“豐”之间的区别与关联。通过对甲骨文、金文及简帛文字等出土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礼”字最早形态为“豊”,“豊”与“豐”音近形似,为同源字,至《说文》小篆时期,“豊”与“豐”已分化为二字,而“礼”字则在秦汉之际由“豊”添加“示”旁最终定型,成为制度与文化的上层概念。本文认为,厘清“豊”与“豐”的字源关系,对于理解“礼”从具体祭祀行为到社会规范的语义演变,具有重要的训诂学与思想史意义。

### 关键词

训诂学, 字源, 语音, 语义

# A Study on the Etymology of the Character “Rites”

## —On the Evolution from “Feng” to “Li”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Jinghan L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2, 2026; accepted: May 22,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etym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haracter “Rites” and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its early forms “Feng” and “Li”. Through the review of unearthed literature materials such a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bamboo and silk tex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arliest form of the character “Rites” was “Feng”, and “Feng” and “Li” are phonetically similar and

文章引用: 梁静涵. “礼”字字源考辨[J]. 国学, 2026, 14(3): 794-798.

DOI: 10.12677/cnc.2026.143111

have similar shapes, being cognate characters. By the time of the Small Seal script in “Shuowen Jiezi”, “豊” and “豐” had already differentiated into two characters, and the character “礼” was finally formed by adding the “示” radical to “豊” during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becoming an upper-level concept of system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clarifying the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豊” and “豐” is of significant phil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礼” from specific sacrificial behaviors to social norms.

## Keywords

Exegetics, Etymology, Phonetics, Seman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中国文化的广阔星空中，“礼”无疑是最为璀璨、也最为核心的星星之一。它并非一个凝固的概念，而是一条奔涌不息的精神长河，其源头深深根植于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精神世界。“礼，就是履行或践行。它是用来侍奉神灵、祈求福佑的。字形由‘示’和‘豊’组成，‘豊’同时也表示读音。”许慎对“礼”字的定义精准地抓住了“礼”的两大定义，实践性与神圣性。然而，文字的形态往往比后世的训诂更能保存古老的记忆。要真正触摸“礼”的初貌，我们必须溯流而上，穿越小篆的规整，拂去金文的铜锈，直抵甲骨文的神秘刻痕，在“礼”及其初文“豊”的字形演变中，探寻那最初天人秩序的蓝图是如何被描绘与构建的。

## 2. 学术前瞻

回顾学术史，“礼”字的早期研究深受《说文解字》的影响。许慎释“禮”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释“豊”为“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这两条训释奠定了后世研究的基础，但其局限也显而易见——许慎仅依据篆文立论，无法看到更早的甲骨文字形，因此“豊”的下部究竟是“豆”还是其他部件，从清代段玉裁开始就产生了分歧。

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曾提出，“禮”字的下半部分实为“鼓”的初文，其含义似乎与祭祀中的乐舞有关。这一观点为“礼”字的解读注入了新的理解。然而到了50年代，他的看法有所调整。郭沫若指出，“禮”属于后起字，金文中偶尔能见到用“豊”字的情况。

21世纪，“鼓说”在若干学者的推动下重新进入学界视野。但商周祭祀的实际考古遗存中，鼓的发现并不如豆类礼器那样普遍和标准化。如果鼓真的是“豊”字的核心构件，是祭祀仪式的代表性器物，那么在考古材料中应当有与之相应的普遍性对应。但目前看来，“豆”形器物在商周考古中的确存在，但其作为“礼”概念的代表性是否足以涵盖“玉”的地位，尚需更多论证。换言之，“鼓字说”的解释力建立在某种文化观念的推论之上，这种推论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支撑。

## 3. 字源考证

从字形结构分析，“豊”表示在器皿中盛放两串玉具，用以供奉神明，《盘庚篇》中所说的“具乃贝玉”正是此意。他进一步推论，礼最初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添加“示”旁；随后义项扩展至对人，再后来扩大为吉、凶、军、宾、嘉等各类仪制。在甲骨文中，便已经出现了“禮”字，字形为“𠄎”，含上

下两个结构部分，具有较强的象形性。上半部由经丝线相连的玉片组成，而下半部分则在甲骨文、金文中被记作“𣎵”，目前学界一般认作“豆”字。近年来“鼓字说”也颇为盛行。秦汉以前，“禮”并未出现从“示”的情况，例如“中山王壶”铭文中还曾出现“𣎵”形，一直到秦汉时期，“示”部才逐渐出现。为了更加明确“禮”的字形解读及意义，我们必须逆流而上，系统分析“禮”字字形的演变。

先看一下“禮”在甲骨文、金文中的用法：

(1) 復口(禀)口(武)王豐，口(福)自天。[1]

(2) [乙]亥，王又(有)大豐(禮)。王(同)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無)(吝)。[2]

例(1)中的“豐”表明祭祀之礼，指武王举行丰福之祭。例(2)中的“豐”孙诒让《古籀余论》释读为“有大礼”。豐，《窻斋胜稿》释读作“豐”，认为是“豐鎬”之“豐”，用作地名。郭沫若认为“大豐”，即《周礼》“大封之礼”。

“大豐”两字又见于金文“麦方尊”，“王乘于舟，为大豐”。结合金文及文献的记载，隶作“豐”释读为“禮”。由此可见，在甲金文中“禮”有“豐”和“豐”两种字形。王国维认为：“古𣎵珣同字，卜字珣作𣎵、𣎵、𣎵三体，则“豐”即豐矣。……此诸字皆像二玉在器之形。许君不知𣎵字即珣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实则豐从珣在 U 中，从豆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𣎵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其初当皆用𣎵若豐二字，其分化为醴礼二字，盖稍后矣。”[3]由此可见，他们二者本来就拥有共同的源头，并且随着后世的使用，又再一次分化而开，独立而行。

在商周，时代盛放玉器的专用礼器(豆、琮)及其所代表的奉献行为，构成了“豐”最核心的构字模式。祭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𣎵中的 U 为豆器的上端，为强调“珣”在“豆”中之形而放大豆器的上部，以明其意。”[4]既然“盛玉以奉神”之器称为“豐”，那么使用此器进行的“奉神”活动自然也可称为“豐”。此即王国维所言“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这是词义从具体器物向相关行为的自然引申。

#### 4. “豐” “豐”之辨

“豐”与“豐”因字形相近，在甲金文中常常混为一谈。李孝定也认为禮、“豐”与“豐”同出一源，“以言事神之事则为禮，以言事神之器则为豐，以言事牺牲玉帛之腆美则为豐。其始实为一字。”

《说文解字》“豐”字焉：豆之丰满者也。从豆，象形[5]。《周颂·丰年》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乌酒乌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传曰：“丰。大也。”然则“丰年”亦此字引伸之义[6]。作为祭祀所使用的礼器，“豐/豐”中盛放的玉、酒食等祭品，必然要求充盈、完备、美好，以表达对神明的最大敬意。因此，“祭祀礼器”这一概念本身，就内蕴了“丰盛”“饱满”“美好”的属性义。随着语言发展，这种内蕴的属性义被频繁使用，逐渐独立出来，成为该字形的常用义项。

从音韵学来看，“豐”与“豐”的语音并不相同或相近，“豐”为脂部来母上声，拟音为[riʔ]，“豐”为终部滂母平声，拟音为[phun]。商周时期各地族群或方言对同一核心词的读音也可能有较大差异，它们的差异也许被文字系统吸收为异体，加速了二字的最终固化与分工。尽管具体音变机制仍需探讨，但出土文献中二字长期混用的证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它们在商周人的语感中是音近可通的。其后世读音的分歧，很可能是在战国秦汉“书同文”过程中，为匹配已分化的词义而被规范、固定下来的结果。

当然，即使读音不同，也不能够直接证明“豐”与“豐”不是同源关系。这个现象似可用“同形异字”来解释，如月夕同形，帚或读为妇，盖月出之时为夕，而洒扫(按：扫，原文误为妇)之役本妇人所司，龙宇纯称此种现象为利用联想，以象形字喻与其相关之某意，代表另一语言，字形上全不加变异。

## 5. “礼”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金文中的“豊”字已不再限于祭祀的本义，其意义逐渐向典礼、规范等方向延伸。以册命、赏赐类铭文为例，整个仪式过程本身便可视作“礼”的具象呈现，这种用法为“豊”最终演变为“礼”奠定了语义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有的宗法等级秩序陷入危机。这一社会剧变直接催生了“礼”概念的语义分化和思想重构。在殷商和西周早期，“礼”主要指祭祀神灵、祖先的仪式规范，具有强烈的神圣性。然而到了春秋时期，“礼”的指涉范围急剧扩展，涵盖了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社会习俗等多个方面。

依据现有出土文字资料，战国末期秦系金文中的“禮”与石刻《诅楚文》中的“禮”，是“礼”字较早的书写形态。由字形增补“示”字旁可见，这一变化不单是文字形体的发展，更折射出“礼”从具象的祭祀活动，抽象为制度与文化层面的上层理念。《论语·八佾》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句话将“仁”确立为“礼”的内在根据——没有仁爱之心，徒具形式的礼乐毫无意义。由此，儒家完成了从“礼”到“仁”的意义升华，礼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在德性的表达。商鞅、韩非等人明确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将“法”置于“礼”之上，甚至用“法”来取代“礼”的核心地位。墨子主张“节葬”“非乐”，对儒家繁复的丧礼、祭礼持批判态度，但其批判并非否定一切礼仪，而是基于“兼爱”“尚贤”“节用”的功利原则，要求简化礼仪以减轻民众负担。阴阳家则将礼与天道运行、阴阳五行联系起来，赋予礼以宇宙论的基础，这一思路在汉代“独尊儒术”后被整合进官方礼学体系，成为“礼”的又一重要意义。《说文》对“示”的解释是：上天降下某种现象，从中可见吉凶，以此向人昭示。古人相信这类特殊征象可用于预测祸福。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示”部字的含义，绝大多数都指向祭祀。“示”旁的添加意味着将“豊”所代表的仪式行为，置于天道与神授的笼罩与之下，为其注入了精神性与规范性的内涵，即周代的礼制），并非人为任意规定，而是天地秩序在人间社会的显现，加剧了思想一统的进程。

除政治思想因素外，“示”字部的添加也是文字系统自身发展的选择。如前所述，“豊”字兼有“器物”“行为”乃至初萌的“制度”多义。随着语言发展，这极易导致混淆。汉字系统遵循“一字一职”或“形义匹配”的经济原则，通过增加义符来分化职能。“示”部的加入，明确了新字“禮”专职负责“豊”的抽象与制度义项，而“豊”本身可逐步退守其本义或古义。当“豊”的引申义礼仪制度与其本义礼器的距离越来越远时，原初字形与当前常用义之间的变得模糊甚至断裂，增加“示”部，是为这个已变得抽象的词重建一个清晰、直接的形义关联。使用者看到“礼”，便能立刻意识到其意义与祭祀、神圣相关，而非仅仅与玉器相关。

此后，随着许慎《说文解字》的定论，“豊”作为独立字逐渐罕用，其“礼”的职能被“礼”字完全接管；而其字形则常被视为“丰”的异体或古体。在典籍传抄中，“礼”用于一切制度、规范、仪节义；“丰”则专用于丰富、茂盛、大等义，但追溯古文时，二者的纠葛仍时常显现。至于现代简化字“礼”，则是依据“礼”的异体字而来，是书写便捷化的产物，与上古字源无直接关联。

## 6. 结语

对于“礼”的考释，不单单是追溯它的字源，从甲骨文“豊”字那祭器奉玉的静默图景，到金文中与“德”相连的规范初现，再到小篆“礼”字“示”旁彰显的神圣范畴，我们目睹了一个核心文化概念如何在文字的形态中被逐步铸造与确立。其本义源于最虔诚的“事神致福”之祭祀仪节，并在西周初年经由历史性的人文转向，演变为一套维系宗法社会的秩序规范。

然而，“礼”的伟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制度设计，更在于先秦儒家赋予它的深邃哲学内涵。从孔子的“摄礼归仁”，到孟子的“礼根于心”，再到荀子的“礼以定分”，儒家大师们不断为“礼”注入新的

灵魂，使其从外在的、可能僵化的仪文制度，升华为一种内外兼修、沟通天人的生命学问与治理艺术。它既要求个体在“克己复礼”中成就道德人格，也要求群体在“礼义之分”中达致社会和谐。

因此，“礼”超越了单纯的文字符号或行为规范。它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钥匙，是把握华夏文明精神特质的核心。从“豊”到“礼”的演变史，正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早期精神生长史，见证了我们的先民如何从对神灵的敬畏与沟通出发，一步步建构起一个以人伦道德为基石、追求和谐有序的伟大文明体系。这便是“礼”字五千年积淀的重量与光辉。

## 参考文献

- [1] 马承源. 何尊铭文初释[J]. 文物, 1976(1): 64-65+93.
- [2] 裘锡圭. 大豊(礼)簋铭新释[J]. 中华文史论丛, 2023(2): 1-23+402.
- [3] 顾涛. 礼与法的语源和“经礼为法”的观念形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7(1): 187-202+218.
- [4] 余超. 古文字示部字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 [5] 张华清, 侯小丽. 禮的字形考辨——兼论禮、豊与豊的关系[J]. 民俗研究, 2019(6): 93-97.
- [6] 張天弓. “豊”“■”考——以《说文解字》之“豊”“■”为主线[J]. 书法研究, 2020(2): 5-30.